

(供内部参考)

木 戈 比

精力旺盛的人们

木 戈 比

附：

精力旺盛的人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木戈比附：精力旺盛的人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8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8}$

1976年8月北京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13 定价 0.52 元

揭穿“生产必然性法则”的秘密

——批判苏修小说《木戈比》

在苏联斯塔利查河畔札克林尼耶村农庄里，一个叫做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办起一个木制品加工作坊，给农庄挣来一座座“五戈比、五戈比的金山”，使车间成了“农庄最有发展前途”，“收入最多的一个部门”和“主要资金来源”。因此，神通广大的谢苗诺维奇成了农庄里“红”极一时的幸运儿。他不但以自己的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得到老上级的鼓励和支持，博得全村人的“脱帽”“鞠躬”，而且连那位曾经决心从他手中夺回劳动力，试图以“土地”为舞台到农业中寻求资金来源的新农庄主席克里莫夫，在“顶了一家伙”以后也不得不返转回来甘拜下风。这就是苏修作家谢·沃罗宁发表的中篇小说《木戈比》的基本内容。

究竟是什么魔力使谢苗诺维奇成了农庄生活的主宰呢？谢苗诺维奇说，因为他“善于做工作”，以“暗号”联络了一批人，这批人最懂得干他们“这一行”的秘密，即“生产必然性法则”，而这个“生产必然性法则”是个无价之宝，离了它农庄就会“寸步难行”，有了它农庄主席也得靠

他谢苗诺维奇吃饭。

看过全篇小说我们就懂得了：谢苗诺维奇所说的“生产必然性法则”并没有什么新奇。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七九页）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在那里剩余价值规律早已成为“生产必然性法则”。

只要剖析一下谢苗诺维奇这个生产管理员兼产品推销员的经营活动，人们就可以看穿这个“法则”的全部反动实质。

首先，因为劳动力在今天的苏联已经成为商品，谢苗诺维奇便以高出大田劳动二、三倍的工钱把农庄的四十三名壮劳力吸引到木制品加工作坊来做纱管和插销座。壮劳力进入作坊之后，谢苗诺维奇便以管理员身份找各种类型企业去签订大批合同，事后又以生产任务紧为名迫使作坊工人延长劳动时间，为他们这伙城乡资产阶级提供剩余劳动。

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精明的谢苗诺维奇，把价值两戈比的插销座，以五戈比的价格出售，从中渔利，看着他那一堆堆戈比变成一个个卢布，铸起他那一座座“五戈比、五戈比的金山”。

最后，做为一个周转过程的终结，农庄柜子里有了

钱，谢苗诺维奇也因为生产有功，获取了每月七百八十卢布又六十九个戈比外加种种福利的高额收入，享受着部长级的待遇，过起了穷奢极欲的资产阶级生活。

从谢苗诺维奇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他所奉行的“法则”，就是用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以及用“骗子”手段牟取暴利的“法则”。

谢苗诺维奇是苏修社会的暴发户，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的苏修农村的吸血鬼。然而，他的显露头角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苏修统治集团多年来大搞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在农村扶植资本主义势力的必然结果。《木戈比》的作者供认，谢苗诺维奇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红极一时，他的作坊被视为农庄的“救命法宝”，原因就在于“别说区里的领导，就是更高的领导”都积极支持他的事业。其实何止于此？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谢苗诺维奇只是活跃在苏联境内的千万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个代表，不过他只是来自基层的一个代表。这一批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在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鱼得水，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鼓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让价值规律盲目调节生产，使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得以重新复活的直接结果。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集体农庄的计划领导是“官僚主义的”，“不必要的”。在一九五五年苏修当局通过的《决议》中就规定以“农产品的商品

产量”做为制定农业计划的依据，开始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调节农业生产。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进一步鼓吹利润挂帅，更公开声称：“计划服从于市场利益”，“利润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经营工作的基础。”近年来，随着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膨胀和整个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搜刮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勃列日涅夫集团更进一步把追求超额利润作为农业企业经营活动的出发点，把苏联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推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轨道。

札克林尼耶村虽小，这里发生的事情却能清楚地告诉人们，今天的苏联农村怎样受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法则”和帝国主义固有经济规律的制约。

一方面谢苗诺维奇利用种种手段使作坊“每个小时都是钱”，另一方面农庄的仓库却没有粮食和任何农产品，穷到“没有东西交售给国家或拿到市场上去卖”以保证给庄员开工资的程度。可以看出，不择手段地追逐超额利润已在札克林尼耶村的农庄经济中起到了绝对的支配作用；“一大清早”，人们“从村子的各个角落”向“赢利多”的木制品加工作坊“接踵而来”，农庄主席却不得不“苦苦央求”“老婆子下地剥亚麻”。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这里就出现了劳动力的自发流动现象，集体农庄的“干草算不上什么值钱的货”，上交牛

奶“得来的钱还不够第一生产队的开销”，不靠谢苗诺维奇的作坊“提高整个经济的利润率”，连农庄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克里莫夫所提出的，“五年或者十年”以后，“用什么来解决吃饭问题”。

其实，札克林尼耶村的这种种奇特现象，不过是整个苏联岌岌可危的农业经济的一个缩影。谢苗诺维奇不是明白地告诉人们，在今天的苏联有“许多集体农庄，其中包括一些大型集体农庄”“副业大发展”，“某些农庄里甚至有收入上百万的成套工厂”吗？在苏修的劳动力市场上，每年不是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农业劳力向城市涌流，从而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农舍十室九空的萧条景象吗？苏修垄断资产阶级不是一面使大片粮田撂荒，不惜抛售黄金靠进口粮食糊口，一面增加对赢利高的棉花作物的投资，拚命扩大棉田播种面积和出口量以猎取高额利润吗？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苏修这个后起的、暴发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有着更为疯狂、更为贪婪的本性。近年来，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霸权，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军工生产，使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特殊的战争经济，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长期落后。苏修小麦产量在二十年中就有十三年比上一年减产，其

中又有七个年头下降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三十之间，这足以说明“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反动政策造成了怎样不可收拾的后果。

当然，苏修垄断资产阶级也十分清楚，戈比尽管可爱，却不能代替粮食，不给雇佣劳动力支付起码的面包，他们也创造不出剩余价值。因此，当粮食生产连年减产的危机日甚一日地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国库和统治阶级宝座的时候，他们便要出来充当本阶级的“救命恩人”了。《木戈比》中那个以“解决吃饭问题”为使命的克里莫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近三两年来，苏修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一阵抓粮食生产的喧嚣。那个吹捧勃列日涅夫“对列宁农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大个人贡献”的农业书记库拉科夫最为卖力。他叫嚷“粮食生产”是“整个农业的一个主导的决定性部门”，提高粮食产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注意的中心”，要以“超越速度”来发展等等。在这一片喧哗声中，克里莫夫放弃大型建筑工地主任的美差，到偏僻的札克林尼耶来“解决吃饭问题”，比起为了个人装腰包而不惜把早就“赔本”的苏修农业彻底挤垮的谢苗诺维奇来，自然更能领会主子的意图，也更能博得主子的青睐。所以，在作者的笔下，谢苗诺维奇是个“只会从生活中捞取所有的好东西供自己享用”的“破坏者”，克里莫夫则戴上了“更多地想着他在其中生活、并为之而生活的社

会”的“建设者”桂冠。

完全说对了。因为以其阶级地位而论，克里莫夫的命运是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吗？身为大型工地主任的克里莫夫，全家住一间房间，儿子要上大学，其收入纵使不比谢苗诺维奇更高，也是相差无几，而决不会与真正存在“吃饭问题”的庄员同日而语。克里莫夫要从谢苗诺维奇手里夺回劳动力，上演他的农业剧，也同样是因为唯有雇佣劳动力能生产高额利润，给垄断资产阶级提供剩余劳动，而决不是因为他比谢苗诺维奇爱护和同情田间剥亚麻的老太婆。而农业剧如果真的演成功了，在主子们以“超越速度”发展“粮食生产”的时髦指令下，能够率先以“粮食、亚麻、肉类和牛奶”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根据不变的“物质刺激”原则，克里莫夫一定会在原有高工资外获取大笔奖金的。既为主子效劳，又不失自己发财之机，而且不冒“非法”之风险，不戴“投机”的帽子，岂不比谢苗诺维奇更高一筹吗？看得出，遵照苏修“党的事业需要”而来的克里莫夫是垄断资产阶级最忠实不过的代理人。

然而，好戏还没开场，立即败下阵来。克里莫夫到札克林尼耶一月有余，初步领教了谢苗诺维奇的“生产必然性法则”和农庄经济的全部秘密之后，就本能地感到他找错了“斗争”对象，于是为了挽回“错误”，顾全他那个阶级的“社会利益”，找上门去给谢苗诺维奇赔礼道歉，“把全

部委曲一古脑儿塞到裤子的后兜里”也在所不惜了。

克里莫夫在谢苗诺维奇面前的败阵以及这“一对死对头”的最后合流都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他们都是苏联社会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以苏修头目制定的路线、政策为指针，奴役和剥削苏联劳动人民，从而替垄断资产阶级效劳这一根本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苏修统治集团的可靠社会支柱，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所不同的是由于暂时的风向变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舞台，而两个舞台相比，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民经济军事化总方针制约下的苏修农业是毫无发达的希望的，因而克里莫夫的舞台是站不住脚的。这就是克里莫夫和谢苗诺维奇之间的一场争斗终以互相依赖、互相勾结的关系所代替的关键所在。

克里莫夫的结局颇有讽刺意味。这个似乎怀有雄才大略的外来人，除了空喊一阵要以“土地”为舞台演出新剧目之外，在札克林尼耶极不景气的农业生产面前一筹莫展，以至重步了老农庄主席的后尘，走上了谢苗诺维奇铺设的“轨道”。不管与作者的意图如何相违，这个结局正预示着，那些把苏修国民经济引上社会帝国主义轨道，目前又面临严重国民经济总危机的苏修头目们，无论喊出怎样响亮的口号，变换什么样的手法，都无法挽救苏修农业面临的总崩溃，也无法以此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也有事实为证。近年来，苏修头目们忽而要提高农产

品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出售更多的粮食，忽而要进行思想教育，号召“农业劳动者，象主人般地关心大田和牧场”，忽而蜜糖一举，由农业书记亲自出马挂奖牌发奖状，忽而大棒一落，要苏联农民“以自我批评的态度”站在所谓“高度的公民立场上”进行反省，以挖掘“尚未利用的潜力”，真是挖空了心思，使尽了力气。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仍有四年减了产。一九七五年，苏修竟比计划少生产了近八千万吨粮食，从而创造了二十年来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新纪录。“吃饭问题”来得这样快，来得如此之迫切，致使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在难题面前又有了新的发明，从研究“烤制小型面包”的“尖端技术”和解决苏联人民“对待面包的态度”这一“精神和道德”课题来寻求出路。这可笑而可悲的事实再一次说明，苏修的所有招数都已失灵，只要他们沿着社会帝国主义“轨道”走下去，就无法医治它给苏修农业带来的不治之症。

不过，根本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一天是会到来的，因为苏修叛徒集团逃脱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我国广大贫下中农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劳动农民只有在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下，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

打碎私有制枷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苏修叛徒集团已把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成果葬送净尽，使苏联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雇佣奴隶。我们坚信，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苏修的奴役。他们必将埋葬大大小小的谢苗诺维奇、克里莫夫及他们的总后台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京红星公社居民区大队五七政治学校

北京师大外语系 73 级开门 办学小分队

木戈比

〔苏〕谢尔盖·沃罗宁著

粟周熊译
高祀

С. ВОРОНИН

ДЕРЕВЯННЫЕ ПЯТАЧКИ

译自《ДЕРЕВЕН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4.

“哎呀，玛丽亚，我过得很好，好极啦！我这儿样样都有：一头奶牛，两头肥猪，一群绵羊，一窝母鸡。你不信，去年的焖猪肉罐头，这会儿还在窖里搁着呢。你瞧，眼下正是打草的时候，这大热的天儿，我的卡佳从窖里拿出一盒罐头，把盖一打开，什么都现成，倒在锅里跟土豆一煎，只听见吱吱地响啊……我们可是大地的子孙，玛丽亚！你去打听一下我尼古拉·瓦辛，谁都知道，谁也说不出不好听的话来。我是什么？我是个工人呀，妹妹。我一辈子都在这儿，在札克林尼耶村。我一步也没离开过老家。我说这些，不是要数落你，不是的。你离开家也好嘛。各人有各人的路子……”

“你就是数落我，我也不后悔。我可见着世面啦。瞧，这会儿我有自己一套单元的住宅。难道我还象你们卡佳一样为劈柴、打水操心吗？炉子是什么样的我都忘了。做饭使煤气，取暖有暖气。我们老早就过上这种好日子啦。可你受了多少苦，才熬到今天不愁吃穿的地步呢？”

“是受过苦，玛丽亚，别提它啦，是受过苦的。不过，什么都过来了，这会儿老觉得可惜的是岁数太大了。你信不信，早先还从来没有象这样怜惜过。多么想活着哟……有时候简直都觉得委屈得很，好象正当我跟别人一样刚刚三十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人蛮不讲理似地给我硬扣上了五十多岁。大早起我站在门口，看着田野、村子，看着斯塔利查河和岸上的榆树——那棵老榆树你还记得吗？看着村子，你知道，我从小就熟悉它，它一直那么吸引着亲人们，有时都叫人心疼得落泪。地里有凤头麦鸡喳喳地叫，椋鸟成群飞来飞去，野菊花在脚下摇来摆去，天空也……我站在那儿在想：莫非这些会离开我？那为什么这么蛮不讲理呀？你是知道的，我这一辈子什么没有受过呀？挨过饿，受过冻，还到过芬兰，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一直都在打仗。瞧这只残废的腿，脸也叫弹片划得坑坑洼洼。彼季卡·萨姆松诺夫老是笑话我，他说光看我的脸就象别的一个什么人……再划得离鼻子近一点儿——你知道人家会管我叫什么哟。”

“快别说啦，你还算幸运呐。”

“嘿，可战争过后呢，玛丽亚，我可跟你打哪儿说起呀，正打着仗，你离开家，就一去不回头，可是我什么都亲身经受过了……不，我不想数落你，不，不过，我想让你知道，当时我是多么快活。上演过一个叫《农庄主席》的电影，你大概看过吧。我们这儿什么都跟电影里一个样，只